



在湾底,看见未来乡村的模样

循迹溯源
“八八战略”引领平安法治建设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见习记者 张闻嘉
通讯员 沈新娜

夏日的宁波鄞州,果香阵阵,蝉鸣声声。当出租车在写着“湾底天宫庄园”六个大字的“开”字牌楼前停下,眼前这个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的村子,瞬间让我们对这次采访之行充满了新奇感。这里,就是如今的湾底村。

沿着宽敞的进村大道,我们来到天宫小区,老吴书记早已等在门口。穿过气派的中式风格大门走进小区,映入眼帘的,是一幢幢现代化的江南小楼,房前屋后,绿树掩映。

“当时,他就是站在这里,对我们提出了殷殷嘱托,我们湾底也从此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70多岁的老吴书记,说话中气十足,神采奕奕。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来湾底调研“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情景,在他的讲述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20年前的“湾底嘱托”

老吴书记正是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村第一书记吴祖楣,1982年当选湾底村党支部书记,是带着湾底奋斗了40多年的老书记。

吴祖楣记得湾底在不断奋斗中跋涉的每一步,但记忆最深的,还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来调研的那一天。

那是2003年9月24日。当时,湾底村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旧村改造、新村建设,全湾底8个自然村,除了有300多年历史的西江古村外,其他7个村6万多平方米老房子全部拆除,合并建成一个新的城市化小区,名为天宫小区。

“工程是2003年动工的,到9月时,我们这里新农村建设刚建了一半,还是个大工地。”吴祖楣回忆,看着建设中的农民新居,习近平叮嘱:“要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与治理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

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牢记殷殷嘱托,20年来,吴祖楣、蔡国成两任书记带领湾底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在“千万工程”的引领下,坚信“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湾底人,以农业为基础,延伸现代服务业,布局文化产业,不断解锁着中国式现代化乡村的共富密码,让湾底村彻底改换了模样。

三大产业齐头并进

40年前,湾底村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村委会委员顾雁冰是土生土长的湾底人,他记得小时候去上学,村里都是弯弯曲曲的黄泥路,一到下雨满身泥泞,“湾底湾底,弯来弯去到不了底”是他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话。当时全乡19个村,湾底的粮食产量连年垫底,“穷”成了湾底村最鲜明的“标签”。

“湾底村怎么才能翻身,村民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1982年当选为村支书的吴祖楣,每天都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他首先想到的,是壮大村集体经济。从村办的小作坊式五金厂起步,湾底挖到了村集

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1993年,各地乡镇企业改制,但湾底坚持“走集体共富路”,选择了集体占大头的股份合作制,先后创办天工公司、巨星公司等7家企业,湾底的村集体经济迅速壮大。

创办工厂的成功,让湾底村完成了第一次创业。“在老百姓身上,一定要舍得花钱,让大家共享发展的红利。”富裕起来的湾底村决定旧村改造,让村民住上城市化的小洋楼。也恰在此时,湾底村迎来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湾底调研之行。

“当时我们只想着乡村环境整治这一步,他想得更长远。”吴祖楣说,于是,湾底开启了第二次创业,将7家村集体企业组建成天工实业有限公司,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同时,借助处于宁波近郊的地理优势,流转土地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农旅结合”,成立农业开发公司和天宫庄园休闲旅游有限公司,举办桑果文化节,建设10大类50多个品种的精品水果种植基地、2700平方米有机蔬菜生产基地,逐步打造出植物园、天宫城堡等一系列“近郊型”休闲项目。

(下转2版)

环卫工人职业技能比武 扮靓环境喜迎亚运



7月25日,杭州云栖小镇嘉德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场上,西湖区城市管理局举行环卫工人职业技能比武。比赛设置了人工清扫、扎扫帚、大型机械清扫、小型机械清扫等项目,内容涵盖环卫日常作业时的各个领域,实操性强,考验比赛者操作功底,以提升环卫工人垃圾收集清运能力,扮靓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迎接亚运会。

林云龙 章文瑜 摄



“民告官”纠纷,看浙江如何“温柔”化解

本报记者 肖春霞 通讯员 项章鹏

7月24日,杭州市行政争议调解中心里,市民张先生和杭州市卫健委代表分坐在会议桌两边,许红叶等中心专职调解员居中耐心协调。这样的场景在这里几乎每天可见,很多行政争议在和风细雨的调解中得以化解。

民与“官”产生纠纷后,能心平气和地平等协商,是有法律赋予的底气的。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国务院《行政复议条例》施行,基本确立“民告官”的法律制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正完善,行政机关、行政复议机关、人民法院不断提升调解在化解行政争议中的重要作用。

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争议解

决途径中通过调解等方式“温柔”化解“民告官”纠纷,能兼顾“法理”与“人情”,是省司法厅联合省高院对行政争议化解进行的创新性探索。它体现着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执法机关单向执法向群众参与性执法的转变。今年6月,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将调解有关内容移至总则,明确调解向前延伸至行政复议案件审理前,正是吸纳了“浙江经验”。

那么,浙江通过调解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实践如何取得实效?调解是否就意味着可以随意地处分或放弃行政权力?又该如何保障调解的公平与公正呢?

行政争议,又称“民告官”纠纷。

很长时期内,调解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中发挥着“案结事了”的实质作用,

但因受“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传统理论等因素影响,这一方式一直游离在法律制度之外。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颁布实施,首次将调解引入行政复议程序,行政复议调解制度被正式确立。201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也规定了,在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中可以进行调解。

浙江于2015年设立全国首家行政争议调解中心,2019年率全国之先实现省、市、县三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全覆盖,并已实现县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全部进驻县级矛调中心。2020年,省高院、省司法厅印发《浙江省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工作规程(试行)》,进一步推进浙江省内各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的实

质化运行。

从“幕后”到“台前”,通过调解来化解行政争议何以能渐成主流?

首先是现实需要和客观要求。一方面行政争议纠纷多样化急切呼唤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另一方面是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客观要求,通过调解来化解行政争议能满足行政法领域对公平与效率的双重追求,从根本上解决纠纷,避免累诉。

其次是调解的实践性。调解是中国智慧、中国经验,用调解方式柔性化解行政争议,更符合中国国情和普通民众的心理。

(下转2版)

湖州市平安实训基地

政法干警轮训 网格员平安实训

行政执法培训 青少年防护教育

0572-2966726